

# 作为认知图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平遥经验<sup>A</sup>

袁年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中, 平遥文化生态保护的经验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积极消融现代文明的战略意义。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 平遥守住了地方的空间体验和地方感, 以强劲的自主性对现代性进行本土化改造, 将古城还原成为一个活态的、属于原居民的空间。与此相应, 平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构的文化空间中, 凭借节庆化的制度安排, 形成了一种向外积极舒展的认知图式, 使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具有节日的娱乐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不容忽视的是, 全球化资本与现代技术的肆意入侵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走向, 文化的主体性容易缺席或被分裂。平遥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 当资本流动性与地方稳定性之间发生普遍危机的时候, 空间地方感的构建、文化的节庆化安排以及文化主体的在场是地方抵制全球化、传统消融现代三个相辅相成的基本单元。其中, 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是这种模式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平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认知图式

**作者简介:** 袁年兴(1975-), 男, 湖北阳新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997年, 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的评价是: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 而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随后, 平遥古城作为旅游胜地积极向外开放, 在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这种背景中, 平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特定场域中, 而是与文化遗产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种向外积极扩展的认知图式, 在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平遥经验。本文旨在剖析平遥文化生态保护的基本路径和特征,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认知图式之后与现代体制的内在关联, 从跨文化的视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提供现实经验和理论总结。

### 一、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地方感

平遥地处晋中盆地西南端, 太岳山之北, 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6'~112°18', 北纬36°17'~37°19'。史称古陶, “平遥县, 古陶地, 帝尧初封于陶, 即此。”<sup>B</sup>春秋时为晋国属地, 战国时属赵国。秦置平陶县, 西汉置京陵、中都县。北魏始光元年(424), 改“平陶”为“平遥”至今。作为我国境内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古代县城的原型, 平遥县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墙、镇国寺及双林寺展开。古城位于县境北部, 旧有夯土城垣, 相传为西周大将尹吉甫所筑。明洪武三年(1370), 为防御外族南扰, 从西、北两面扩建城墙, 在旧城垣基础上重筑扩建, 奠定了古城规模。<sup>C</sup>城池周长6162.68米, 墙高10米, 上有垛口、敌楼、角楼、奎星楼和瓮城等建筑, 整个城池面积2.25平方公里。

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 平遥古城在保护和开发利用之前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毁坏, 城墙多处倒塌, 城内的许多古建民宅也被新式建筑不断侵蚀, 整体的印象是“干巴巴”、“灰

<sup>A</sup>本文系“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山西省文化厅和平遥县文化局为我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借此谨致谢忱。

<sup>B</sup>(明)胡濙纂,李侃修:《山西通志·建置沿革》[M].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山西大学馆藏。

<sup>C</sup>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5页。

土土”、“闷沉沉”、“脏兮兮”的平遥。平遥古城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成就是没有将古城做成一个关于明清建筑 and 文化的博物馆，而是将其还原成为一个活态的、属于原居民的空间，对外而言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化体验区。

平遥古城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保留了明清时期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鸟瞰平遥古城，平面布局形似龟状，有“龟前戏水，山水朝阳”之说，故平遥古城也俗称“乌龟城”，蕴含着古代平遥人希望借龟神之力保护平遥古城坚如磐石、金汤永固的寓意。古城整体空间布局还蕴藏着我国古代太极阴阳和谐的基本理念——以南大街为中轴线，市楼跨街而过，对称式布局。城内街道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之称。沿街店铺林立，后接四合院，形成前街后宅功能明确的格局。在对空间进行再生产之后，传统文化符号的主调，再融入和点缀地方喜庆祥和的色彩要素，这丰富了平遥古城作为一个“地方”的视觉体验效果。

地方感是地方性知识的深化体验，是作为一种类型与全球化、一体化抵抗的文化感悟。平遥古城的地方感不仅来自文化景观带来的视觉冲击，而且日常生活中的触觉体验也颇为深刻。平遥古城的民居多为四合院，一般沿中轴线由几套院组成，中间多为矮墙、垂花门楼分隔，形成二进和三进的“日”或“目”字型布局。院内能闻到绿色植物的自然清香、花香泥土的清香芬芳以及传统民居砖木材质的独特气味。触摸古民居的门窗、门环、楼梯扶手、日用家具等器物，还有那热炕带来的全身温暖，你能够深度体验到传统生活的质感和智慧。放慢行走的步伐，穿上这里的手工布鞋，踏着名商巨贾的脚印登上市楼，享受不仅是手工布鞋等带来的温暖，让人浮想更多的是晋商足迹及其诚信进取的晋商精神——他们北上草原沙漠，南下水乡茶山，以致“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

在平遥古城的大街小巷中，冠云牛肉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醇香可口”被人们赞不绝口，而“长昇源”老字号黄酒则被誉为“中都一绝传佳酿，弘扬古风留墨香”。肉质鲜嫩浓香扑鼻的“曹家熏肘”一度为商贾大户青睐的风味肉制品，现在成为好客的平遥人宴请宾客的佳肴；而平遥碗脱“既有凉粉的清爽利口，又有灌肠的浓烈香味，精而不腻，滑利爽心”。沿着西郭家巷往西巷与沙巷北段方向走去，一路都是醋的沉香、枣的酸甜以及“晋升油茶”的酥香，抑或还夹杂着有长山药散发出的温馨香气。或许，你还能看到城隍出游的锣鼓开道、牌坊上的风铃声以及礼乐或歌舞的声音。偶尔，远离城楼的城墙段有人点起古代使用的“狼烟”，紧张的氛围让人感觉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中，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的所在。在全球化资本与现代技术肆意入侵的背景中，传统的空间无疑被烙上了现代性的印迹。因此，在传统文化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地方感的出场是地方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多样性与同质性相抗衡的基本手段。平遥的经验在于守住了地方的空间体验和地方感，以强劲的自主性对现代性进行着本土化改造，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具有地方性知识消融现代文明的空间策略意义。

## 二、认知体系的再分类与重构——“世界的平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应该思考人与地方如何产生情感联系，人们如何认同、记忆、想像某个地方，又如何排斥某些元素进入“我们的”地方，并思索“地方特色”是否因为全球化的席卷而消失殆尽。威尔斯大学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教授 Tim Cresswell 曾经认为，地方是时空之流中依条件而定的“恒常”形式，当资本流动性与地方稳定性之间发生普遍危机的时候，地方必然要发生变迁与重构，因为地方是争取资本的基础，所以是集体记忆的所在。<sup>A</sup>也就是说，地方作为一种认知体系，通常都是一个变化开放的空间，也凝聚了群体的记忆和感情归属。

<sup>A</sup> (美)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年,94~101页。

## （一）平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口头传说、礼仪节庆和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种类繁多、特色鲜明。根据文化部2005年6月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部署，该地区经过三年的普查工作，已建立了涵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项，省市级4项，县级53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密切相关，而且大多数与晋商的文化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平遥传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传统戏曲类项目为例，明清时期的晋商凭借雄厚的资财，修建深宅大院，自创或资助戏班剧社。同时，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他们因远离家乡，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所驻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这些对地方戏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以传统武术为例，由于晋商外出经商常在数千里外，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甚至盗贼的袭击，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特别是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创新和发展，都得到了晋商的鼓励与支持。武术与拳师对于晋商的活动，有着保护安全的作用，而晋商对武术与拳师的鼓励、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武术活动的作用。从整体上看，晋商文化在平遥文化生态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蕴含着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地方意识和文化心理。在平遥的地方性知识中，“乐武双峙”是其主要的表现形态。“乐”，即寓乐于当下，是一种“乐在其中”的审美愉悦，这主要表现在平遥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节庆习俗、人生礼仪及民间信仰中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乐观的心态；“武”，即尚武精艺、勇以为用，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身体力行，这主要表现在传统武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相关的道德修养。“乐”与“武”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都蕴含着儒家“仁”、“义”、“礼”等精神内涵，反映了平遥人民以乐观态度对待生命，同时要求保持身心和谐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单以民间吹打乐为例，平遥民间吹打乐分粗乐和细乐（又称武场和文场）两种，粗乐，泛指用打击乐器组合进行演奏，故称武场。细乐，即指在打击乐器的演奏中杂夹唢呐、笛子、二胡、低胡等演奏，又称为文场。戏文既有《梵王宫》、《将军令》、《祭红》等“武”文化的内容，也有《二度梅》、《金水桥》、《四句皮腔》等民间娱乐的表现。乐武文化的双峙并举体现了平遥文化体系中情本体与实用理性的兼容统一。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化”的制度安排

在调研过程中，平遥文化局负责人多次强调：“平遥是世界的，古城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成为古城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人，我们将致力提高全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保护的自觉性，不断完善保护体系，使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完美结合。”在具体的现实操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化”是一项基本的策略。

首先，平遥县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及旅游市场的活动规律构建了一整套跨越一年四季的节庆活动，其中包括弘扬晋商文化的春季“平遥商业月”、弘扬科举文化和武术文化的夏季“科举文化节”与“武术文化系列活动”、弘扬平遥艺术的秋季“平遥国际艺术节”以及弘扬平遥传统风俗的冬季“平遥中国年”。这种“节庆化”的制度安排，激活了静态的文化景观，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深度挖掘和延续。以2009年9月举办的平遥第二届漆文化艺术节展示的《百猫戏春图》、《平遥古城》、《献寿图壁挂》等漆器精品为例，不仅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和历史价

值；不仅创造出数以千万计的经济效益，更为平遥古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其次，政府部门是节庆活动策划者和组织者，包括设立工作主体、提出工作目标、提供专款、规范操作流程、提供法律依据等，旅游企业负责旅游纪念品、旅游工艺品等的种类、价格、销售状况，商店、摊点等销售单元的地理位置、营业时间、营业状况等。节日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打造相关项目（包括文化遗产）的宣传平台，加强业内交流，并增加旅游经济收入。

再次，平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节庆化”的制度安排属于打造“平遥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遥县致力于打造的“平遥品牌”，是将整个产品服务体系、市场促销活动、市场宣传方案都融合到整体“品牌”体系下，其中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汉民族明清文化”，并作为“平遥品牌”的背景文化元素。在向外推展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借助了灯光、音响、电脑技术及现代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在这种背景下，“保护”与“打造”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平遥品牌”，打造“平遥品牌”则有利于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宽阔的空间。比如说，人们提起平遥古城就会马上联想起平遥的“三大宝”（牛肉、漆器、绣花鞋），而提起“三大宝”之一如推光漆器就会马上联想到平遥古城。也就是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认知图式之后，与“地方”密不可分。

### （三）节日活动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平遥形式多样的节日制度安排中，民间艺术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平遥民间艺术展包含乡土艺术展、民间绘画艺术作品展、雕刻艺术展以及民间楹联展。乡土艺术展展现的艺术作品有剪纸、皮影、绢人、面塑、泥塑等，同场还请民间工艺大师现场制作与现场传艺，部分制作成品现场拍卖；民间绘画艺术作品展展现的艺术作品有括木版年画、炕围画、漆画等，作品大多采用年节及平遥当地民俗活动为题材；民间雕刻艺术展展包括木雕家具、艺术作品展，砖雕、根雕艺术作品展，同时晋中砖雕、木雕、根雕的民间艺人现场展示技艺；民间楹联展包括布置两条楹联文化街，展示并进行灯谜楹联活动，期间还举行楹联书法笔会，请平遥当地书法家现场献艺，应邀为观众挥毫留字。

平遥还以古城为依托，成功推出了“平遥中国年”节庆活动。平遥县政府2009、2010、2011分别以“百台大戏乐平遥”、“百家社火闹平遥”、“万家灯火靓平遥”为主题，成功举办了三届“我们的节日·春节——平遥中国年”系列活动。“平遥中国年”活动内容丰富，包含有秧歌舞、狮子舞、龙舞、高跷、旱船、背棍、铁棍、抬阁等民俗表演。近几年来，平遥还分别在古城墙、县衙内、南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灯会。观花灯，猜灯谜，并为这一传统形式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平遥中国年”活动中，“包饺子，写春联，闹社火，看焰火，拜大年”是全民参与的活动节目。期间，县政府还组织了当地民间剧团进行戏曲演出，并免费观看。这些民间过大年特有的民俗内容，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安排，从记忆回到了现实。

“平遥国际摄影展”和“平遥推光漆器艺术节”是平遥从“地方”走向“世界”的两项重要的节日安排。其一，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立于2001年，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七届，共有176国次2.2万人次的中外摄影师和贵宾直接注册参加了大展，历届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国际顶级大师有马克·吕布（法）、克里斯蒂安·葛约尔（法）、阿尼亚茨（法国）、弗兰克（美）、麦吉尔（美）、何奈·布里（法）、普雷基（美）、郎静山（日）等。期间，许多国际知名媒体还与平遥国际摄影展进行合作。其二，平遥推光漆器艺术节包括推光漆器展销会、精品展示拍卖会 and 漆器工艺可持续发展论坛。展示的作品主要有高档屏风、挂屏、电视柜、大小衣柜、酒柜、首饰匣等，除平遥本地的作品外，主要来自北京、福州、重庆、山东、广东、陕西、苏州、台湾以及日本与韩国。节日期间的发展论坛主要是就雕刻、绘画、书法等实用性工艺进行研讨。此外，平遥传统艺人还会在现场展示生产工艺流程。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传统的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或抒情达意（如民间音乐类），或闲暇娱乐（如民间戏曲、曲艺、杂技类），或歌功颂德（如民间文学类），或强身健体（如民间武术、医药类），或敬畏生命（如民间仪式、舞蹈类）等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何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事关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体制相结合，而且也事关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度。在平遥县的节日制度安排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向外展现，具有节日的娱乐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被部分遮蔽的现实背景中，平遥这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化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除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技术化、组织化的控制，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重新分类和重构后，有利于使从日益萎缩的日常生活空间向外界社会拓展。对于平遥本地居民而言，这种节日活动安排有利于彼此之间在节日的互动中增强文化的体验和认同感，属于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的一种可行策略，也是个体通过文化共享而形成有机共同体的一种重要途径。

### 三、个体解放、资本市场与文化主体问题

毋庸置疑，平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相对于那些“重申报而轻保护”的地方而言，平遥的空间策略及节庆化的制度安排具有值得推而广之的积极意义。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平遥能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主要依赖于异化的日常生活能否在节庆中恢复，依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在现实操作中显得异常复杂。在对平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采访中，我们能够体会旅游市场对于非物质文化有遗产保护的意义所在，同时也能够洞察出现代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是如何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走向。

案例一：旅游市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访谈对象：薛生金，男，72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光漆器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2日；访谈地点：薛生金工作室。

平遥推光漆器在春秋时期就已具雏形，汉代时期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清中期到民国初，平遥票号、钱庄的兴旺发达给漆艺制品带来很大的商机，平遥推光漆器工艺得到长足发展。解放后，1958年3月，成立了平遥县推光漆器厂，请老艺人乔泉玉、任茂林等进厂献艺授徒，从此平遥推光漆器工艺进入黄金发展期，产品通过北京口岸进入国际市场，销往欧、美、东南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到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国有企业也进行了体制改革，平遥县推光漆器厂倒闭了，推光漆器一度停业。近几年在旅游的带动下，平遥推光漆器作为与古城齐名的“三大宝”之一，手工作坊得以迅猛发展。目前平遥漆器生产作坊达到100余个，销售点达到47个，从业人员2000余人，年生产总值上亿元。

平遥漆器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工序，包括大漆制漆工艺、桐油炼制工艺、制灰挂灰工艺及漆栓制作工艺等工艺技法。其中大漆制漆工艺是整个工艺的核心。天然大漆从漆树上采集下来不可直接使用，须采用一套特别的工艺，特别的配方和特制的设备进行炼制方可使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漆器制作商为了降低成本，制作漆器大量使用化学漆和腰果漆，但任何化学漆和其他植物漆，从耐久性、色泽、附着力、抗热、可雕等理化性能，以及漆层厚度、漆的品质等艺术附加值和工艺要求等，无论如何不可和天然大漆相比匹。旅游市场的无序竞争和缺乏科学管理，将导致传统平遥推光漆器工艺将面临断代的威胁。

平遥推光漆器的案例告诉我们，旅游市场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文化解放的意义。从文化的人本寓意出发，文化的实践特征决定了人的自由维度和“类”的特性，特别是对于个体而

言,文化身份的解放是回归日常生活的基本途径。<sup>A</sup>在平遥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个体解放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曾经被视为“落后”、“迷信”、“封建”的文化行为得到了合法性的认可,甚至是鼓励;二是一度萎缩的传统文化生存空间被再次激活,一些传统艺人能够重新拾起丢弃多年的技艺,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个体的解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属于一个文化生态问题,涉及的不仅仅生态环境的问题,还存在有个体在资本市场追求最大利润的诱惑。也就是说,解放后的个体被一只无形的手——资本市场所控制。

同样的问题在民俗旅游节庆中得到了体现。从理论上讲,传统文化的节庆能够有效解除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技术化的控制人,使人们能够重新找回传统文化的快乐感觉和欢乐场面,但是个体在节庆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节日不同的文化效果。平遥县在对节日旅游的规划中强调了三个层面的作用:(1)旅游者,特别是他们在节事主办地的服务需求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和活动方式;(2)居民,尤其是他们在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时的角色和态度以及他们对旅游者影响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的关注;(3)旅游者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即两群体之间接触的类型、特点以及对各方造成的结果。<sup>B</sup>以2011年“平遥中国年”为例,平遥春节社火表演主要由企业、乡镇、学校等单位参与,参与人数4000余人,而观众达到两万余人。展演实现了民俗与现代结合,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主题与内容相吻合,形成一道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在社火展演的前几天,许多外地客人、媒体或电话、或现场咨询社火展演的相关情况,演出现场更是照相机、录像机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平遥县规划的文化节日活动是围绕着服务与被服务的维度展开的,那么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能否从文化节日这项“服务”中获得实惠就成了支配其行为的基本准则。对于更多没有利益追求的居民而言,他们仅仅是观众而已。

在日常生活遭遇现代性异化的现实背景下,列斐伏尔曾经把节日和狂欢比喻为日常生活的“革命”,认为节日能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在日常生活批判的路径上,他关注民众的节庆、狂欢等形式,主张让古代节日与现代都市生活相整合,创立一种“能够消除日常生活与喜庆气氛之间的冲突”的城市现实。然而,列斐伏尔主张借助于审美、感性回归、节日和狂欢能够超越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端,却忽视了节日中的主体结构关系。借用 John Urry 所谓的“游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sup>C</sup>的术语,这种“看”与“被看”事实上带有强烈的权力支配关系,意味游客的存在决定着传统文化现象的再现,而文化的全部意义则在于满足游客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的缺席。在这种情景下,没有“游客凝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案例二:没有“游客凝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访谈对象:冀云丽,女,46岁,平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纱阁戏人”代表性传承人;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3日;访谈地点:冀云丽住处。

纱阁戏人用料非常普通,主要有洒金宣纸、生丝、胶泥、稻草、高粱杆、草纸、颜料、铁丝、硬纸板、铝箔纸、棉花等等,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老百姓熟悉和喜爱的晋剧、京剧、昆曲舞台上的传统戏剧。在原先,师父们在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纱阁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县城内的居民也在办丧事的时候租赁回去摆设供奉给亡者,这样也算是请亡者看戏了。后来由于被称为“迷信”用品,纱阁戏人停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纱阁戏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年长日久,缺乏好的重视和维护,原先保留下来的戏人已经大多被虫蛀、风化或干裂了,颜色脱落得很严重。而现在做的纱阁戏人,随着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这种工艺也没有人愿意学习了。

<sup>A</sup> 袁年兴:《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sup>B</sup> 参见《平遥旅游目的地发展规划》,北京中科景苑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联合设计,2005年9月。平遥县文化局提供。

<sup>C</sup> (英)约翰·尤瑞(John Urry):《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杨慧、赵中玉、王庆玲、刘永青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现代性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权力关系的结构是矛盾对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性目的在于解放现代性技术对人们的控制，从而使人们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从上述几个案例可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向外舒展的认知图式来加以传承和保护，属于一种利用现代性技术来抵抗现代性入侵的方法论。这种看似矛盾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可取之处。从策略层面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立足于传统文化如何消解现代文明意识和思维，而不是被动、静止的保护，在这层意义上，上述看似矛盾的方法论将可以存在更多的历史责任。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在由空间、节庆和共同资源进行多样组合的制度安排活动中，解放后的个体的文化主体不经意被淡化或忽视，文化实践因“他者”的存在而再现，这也意味着文化的主体让位于作为游客的“他者”。这对文化共同体的重塑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 四、小结

我国人类学家高丙中教授曾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社会的历史见证，提供了重塑现代文化生活以及文化共同体的丰富资源。<sup>A</sup>平遥立足于地方性知识消融现代文明的文化策略，以强劲的自主性对现代性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多维度构建了传统与现代体制共生融合的主导界面与基本路径，其本质是共同体的意义世界在时间维度得到延续和发展。平遥的经验告诉我们，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向外舒展的认知图式时，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个体、群体或社区的保护与传承行为过渡到社会层面的全民认知和参与，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但是在日常生活异化的背景中，现代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走向，文化的主体容易缺席或被分裂，个体的能动性发挥及其认同成为了一项极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的主体因缺席或被分裂而缺乏内在的凝聚力，从而也就使这种使用现代性技术来消融现代文明的策略受到明显的制约。由此可见，当资本流动性与地方稳定性之间发生普遍危机的时候，空间地方感的构建、文化节庆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文化主体的在场是地方抵制全球化心、传统消融现代的三个相辅相成的基本单元。其中，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是这种模式的关键所在。

#### As a cognitive schemat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Ping Yao is a kind of strategy for local knowledge how to ablate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global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spatial reproduction about Ping Yao being kept a space experience and local feeling, with a kind of powerful autonomy to nationalize the modernity, is a basic means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gainst the modern way of lif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Ping Yao in the cultural space, with the system arrangement, form a kind of positive outward cognitive schemata and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ractice of daily life to the outside world with holiday entertaining and content of the richness. Not least, the modern capital eff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ubject of culture was divided. The experience of Ping Yao show that when liquidity and local stability occurs between the universal crisis, place must happen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lace feeling, cultural festiv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ll the basic elements for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blate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 Ping Ya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gnitive schemata

---

<sup>A</sup> 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